

以利益訴求為出發點的考察 ——評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 (1919-1927)》

• 王 超



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共產國際與中國的關係錯綜複雜，由於受政治的干擾以及資料的限制，學界長期以來甚少從純學理的角度進行研究。隨着中國大陸思想的漸趨開放和學術的逐漸自由，

一批學者開始關注和研究這一課題。尤其是蘇聯解體後相關檔案的相繼解密，更為學界對中蘇關係各個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條件，一批相關著作相繼問世^①。但就現有成果來說，大多數研究局限於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係，以及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影響的論述，較少有專著研究共產國際與國民黨的關係。李玉貞積數十年研究之大成，依靠豐富的俄文原始資料，大量採用中國大陸、台灣和海外的相關文獻及研究成果，著成《國民黨與共產國際（1919-1927）》（以下簡稱《國民黨》），引用只註頁碼），系統論述了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在1919至1927年之間的關係，並解決了一系列存在爭議的學術問題。

李玉貞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俄羅斯語言文學系，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長期從事共產國際與中國關係、中蘇關係等研究和史料編纂、翻譯工作，在這些研究領域著述頗豐^②。而《國民黨》一書則是李玉貞在長期編纂、翻譯蘇俄史料和研究中蘇關係

李玉貞依靠豐富的俄文原始資料，大量採用中國大陸、台灣和海外的相關文獻及研究成果，著成《國民黨與共產國際（1919-1927）》一書，系統論述了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在1919至1927年之間的關係，並解決了一系列存在爭議的學術問題。

的基礎上，積數十年研究之大成而推出的一部最新力作。該著立論新穎，觀點獨特，內容廣泛，資料翔實，尤其使用了大量蘇聯的解密檔案史料，是一部全面研究國民黨與共產國際關係的嚴謹學術著作。本文從三個方面對該著進行評價。

一 共產國際與國民黨的利益訴求

長期以來，受政治立場的局限和意識形態的禁錮，中蘇兩國學者對中蘇關係和共產國際與中國關係的研究都只片面強調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在經濟、政治、組織和軍事等各個方面的無條件援助，努力塑造共產國際的良好形象。而李玉貞則依據史料，「以蘇俄和中國國民黨各自的利益訴求為分析的主軸，探討了雙方合作的基礎及限度，雙方分歧的由來與矛盾激化的原因，清晰地勾勒出國民黨與蘇俄和共產國際關係發展演變的來龍去脈。」（章百家：〈序一〉，頁1。）這是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對《國民黨》一書的評價，也是該書的基本線索和主要內容。

共產國際成立於1919年，總部設在莫斯科，是由列寧領導創建的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團體的國際聯合組織。1922年，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成立後，便與國民黨和中共等組織團體和地方勢力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對中國革命的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對共產國際進行研究有利於全面認識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和革命歷程。

長期以來，蘇聯史學站在無產階級黨性立場上，承襲斯大林主持編纂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從世界革命的角度出發，強調蘇聯對孫中山、國民黨和中共革命的援助，至於共產國際如何為蘇聯外交和保衛蘇聯服務則很少涉及（〈前言〉，頁3-4）。而李玉貞認為，國家利益應是研究這一問題的切入點，它是國民黨和共產國際合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從這一角度出發才能理解和分析共產國際與國民黨關係的演變。把共產國際和國民黨的關係置於雙方利益的需求之上，有助於認識雙方關係的建立、沿革和最終破裂。

共產國際成立後，成為蘇俄對華的一個重要外交渠道，其對華方針和策略服從於蘇俄的外交需要，反映了蘇俄的利益需求與實際需要。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推翻了臨時政府，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新政權成立後面臨內憂外患的艱難局面，國內反革命勢力猖獗，西方列強合謀對其進行外交孤立和武裝干涉。列寧為了維護新生政權，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單獨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實現停戰。同時，蘇俄為了改善外交處境，爭取中國支持，於1919年7月25日發表《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宣布廢除同中國締結的秘密條約，放棄侵佔的領土，拒絕庚子賠款，放棄一切特權^③。1920年9月27日，蘇俄又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宣布「以前俄國政府歷次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俄國租借，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從中國奪得的

李玉貞認為，只有從國家利益角度出發才能理解和分析共產國際與國民黨關係的演變。把共產國際和國民黨關係置於雙方利益的需要之上，有助於認識雙方關係的建立、沿革和最終破裂。

一切，都無償地永久歸還中國」^④，以爭取中國支援，改善國際處境。但由於蘇俄與北京政府在外蒙古撤軍和中東路鐵路等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雙方關係未能很快改善。

另一方面，孫中山在革命屢次遭遇失敗後，於1919年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試圖整頓組織，統一思想，建立軍隊，推翻北京政府，統一全國。1921年5月，孫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準備北伐。其時，國民黨組織不力，經費短缺，軍事力量薄弱，孫及國民黨亟需蘇俄在組織、軍事、經濟、政治等各個方面提供援助和支持。蘇俄與北京政府在外交上的停滯不前為國民黨與蘇俄關係的建立創造了機會。

共產國際選擇孫中山作為合作對象經歷了一個頗為曲折的過程，這也反映了蘇俄的國家利益和實際需要。起初，吳佩孚答應在1923年進軍外蒙古以減輕北京政府要求蘇俄撤軍的壓力，因而獲得了共產國際給予援助的承諾。陳炯明主政廣東期間，發展經濟，興辦教育，禁煙禁毒，實行縣級自治和司法獨立，廣東政局為之一新，引起了蘇俄的注意。陳因為同意共產國際在廣東設立辦事處，共產國際認為有利於對亞洲輸出蘇式革命，從而對陳採取支持政策（〈前言〉，頁15）。從中可見，共產國際選擇合作對象的最根本出發點就是維護蘇俄國家利益，貫徹其推行蘇式革命和革命道路的方針。

後來，因蘇俄拒絕從外蒙古撤軍，企圖實現外蒙古事實上的獨立，同時共產國際鼓勵工運妨礙了吳佩孚轄區的安定（〈前言〉，頁15），吳遂轉而反蘇，於1923年鎮壓京漢

鐵路工人大罷工，通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 (Henricus Sneevliet) 和陳獨秀等人，公開反對蘇俄和共產國際。陳炯明則因1922年「六一六事變」而被共產國際定位為「反革命」，於是共產國際轉而選擇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作為合作對象。此後，「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便在一個援助與被援助的框架中展開」，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也因涉及雙方利益而屢現波折（頁110）。正如李玉貞所言：「共產國際同中國國民黨的聯繫是在中蘇國際關係的整體中展開的。」（頁98）共產國際根據蘇俄國家利益努力在華尋找代理人，而中國各派軍政人物也根據戰略和實際需要決定與蘇俄的關係。從雙方的利益需求和實際需要出發，有利於理解共產國際與國民黨等中國勢力關係的演變，從而發現隱藏在其中的一貫性。

二 革命模式的爭執與主義的較量

1896年，孫中山因「倫敦蒙難」而聞名俄國，並因其「革命志向、改造社會的理念和實踐」與俄國人士產生接觸（頁2）。孫與這批蘇俄人士在奮鬥目標和行動方針等方面有諸多共通之處。在列寧時期，孫就因其提出的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而得到了列寧的關注。1912年，列寧在他的〈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中一方面讚揚了孫的民主主義，但另一方面也嚴厲批判了他和平解決社會矛盾的空想性，而「威脅國民黨與共產國際關係並導致其破裂的伏線恰恰就是這時候埋下的」（頁15-16）。列寧主張徹底的社會革

共產國際根據蘇俄國家利益努力在華尋找代理人，而中國各派軍政人物也根據戰略和實際需要決定與蘇俄的關係。從雙方的利益需求和實際需要出發，有利於理解共產國際與國民黨等中國勢力關係的演變。

雖然國民黨領導人都反對蘇聯的革命道路與理論，但對共產國際採取了相當實用的策略，一方面接受援助，另一方面極力維護三民主義，並設法使共產國際承認這個理論。這促成了雙方合作關係的建立，但也促使了矛盾和分歧的產生。

命，而這一論點又為斯大林所繼承，「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成了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理論和實踐評論的準繩。」(頁18)蘇俄領導人只認同自身的革命道路和理論模式，並將其作為評價國民黨及其領導的標準。這一標準又為共產國際所襲用，最終導致了與國民黨合作的失敗。

共產國際與國民黨建立聯繫是為了在中國推行其一貫主張的全面的社會革命，並鼓吹國民黨發動工農革命和階級鬥爭，以推翻北京政府，「而國民黨從根本上並不贊成共產國際的理論，所以其政治主張、觀點乃至行動，時時都有表現。」(頁144)書中指出，「對蘇式革命道路、蘇式共產主義和蘇維埃，他〔孫中山〕從根本上持排斥立場，這也是國民黨的主要政治傾向。」(頁146)實際上，孫中山、戴季陶、胡漢民、汪精衛和蔣介石等國民黨領導人雖然政治傾向存在差異，政治主張存在分歧，但都反對蘇聯的革命道路與理論。與此同時，國民黨「對共產國際採取了相當實用的策略，一方面接受援助，另一方面極力維護三民主義，並設法使共產國際承認這個理論和國民黨成為中國的『正統』」(頁374)。雙方互利，各取所需，這促成了合作關係的建立，但也促使了矛盾和分歧的產生，並最終導致雙方關係的全面破裂。

共產國際和國民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分歧和矛盾由來已久。1905年同盟會成立，在孫中山的堅持下，同盟會便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內容的「三民主義」作為奮鬥目標和政治綱領。雖然同盟會內部對以上內容存在爭議，尤其對「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分歧重重，但這一綱領的主

要內容和基本框架此後一直為國民黨所堅持和貫徹。1919年國民黨頒布《中國國民黨通告及規約》，明確規定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三民主義首次載入國民黨黨章。1923年1月1日國民黨發表的《中國國民黨宣言》明確表示：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⑤。1923年《中國國民黨黨綱》更對「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進行了明確的界定和闡釋。實際上，三民主義自始至終為國民黨主要領袖所遵循和貫徹。

從1920年起，共產國際的代表就陸續來華，努力宣傳共產國際理論，宣揚馬列主義，以達到輸出蘇式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目的(頁43)。但誠如李玉貞所指，「共產國際一廂情願地用蘇俄模式來看待國民黨，用它來衡量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並試圖用共產國際理論來改變國民黨」(頁73)，這自然導致了它與國民黨的矛盾和衝突。孫中山自始至終都對蘇聯的革命道路和革命理論持反對和排斥態度。1923年1月26日，孫與越飛(Adolf A. Joffe)聯合發表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開宗明義提出^⑥：

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

這一宣言為國民黨的改組和國共合作奠定了基礎，為國民軍北伐準備了條件，但同時也預示了今後國共分裂和國民黨與蘇俄關係破裂的結局。

李玉貞認為：「國民黨和共產國際都不會放棄其政治目標，但是二者的關係又離不開各自的利益。」（頁98）國民黨出於爭取蘇俄政治、經濟、軍事、組織、宣傳等方面的援助和支持而選擇與共產國際和中共合作；而共產國際為了推行蘇俄革命，宣傳其理論和主義，也選擇了國民黨作為合作對象。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國民黨改組完成，國共合作關係正式建立。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方針後，蘇俄為國民黨派遣顧問，輸出組織理念，提供武器，協助建立軍校，為國民黨在組織上和軍事上的壯大提供了重要幫助。在共產國際和中共的幫助下，國民黨健全了基層黨部，成立了黃埔軍校，加強了基層組織，培養了大批軍政人才，工農運動興起，宣傳取得很大成效。

但孫中山所實行的「容共」政策是有限度的，孫表示：「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⑦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合作只是出於各自利益和需要而暫時達成的妥協，雙方在中國的革命道路和指導思想上的根本分歧和矛盾從合作開始就已存在，到後期隨着國民黨北伐的順利推進，以及英美等國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支持，國民黨便起而反蘇反共。李玉貞以雙方利益為切入點，分析了共產國際對華政策的演變以及由此引發的結局。

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後清黨反共，共產國際支持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走上了反蘇反共的道路。國民黨在取得全國政權後，繼續以三民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和治國綱領，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策略遭到完全失敗。而共產國際所推崇的「武裝暴動」和「全面革命」則繼續為中共所繼承，並導致中共在革命初期屢遭失敗。

三 派系劃分與「楔子策略」

共產國際劃分派系的做法由來已久。1919年，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就以對待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殖民地問題的態度為標準，把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活動家劃分為左派、中派和右派。這個標準雖依世界政治局勢的演變增加了新內容，如把對十月革命和蘇俄的態度作為劃分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頁45-46）；但共產國際在內部確立的這種劃分派系的做法和策略——打倒右派，分化中派，依靠左派——一直沒有改變（頁282），並積極運用在與國民黨的合作中，其後又為中共所繼承和使用，對中國革命的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

李玉貞指出，「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中國國民黨，其內部思想觀點的政治化都與共產國際有關係。」（頁45）1920年，共產國際遠東局局長維金斯基 (Grigory N. Voitinsky) 來華就極力鼓吹學生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商人劃清界限。劃分派系成為界定政治正確與否的標準，並上升到「革命」與「反革命」的高度。「革命」與「反革命」這一對概念

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合作只是出於各自利益和需要而暫時達成的妥協，雙方在中國的革命道路和指導思想上的根本分歧和矛盾從合作開始就已存在，隨着國民黨北伐的順利推進，以及英美等國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支持，國民黨便起而反蘇反共。

根據鮑羅廷的策略，要依靠和壯大左派，形成左派運動，爭取中派，剔除右派，他稱這種做法為「楔子策略」。共產國際的代表在國民黨實行左、中、右派的鑒定和劃分，並根據政治屬性決定方針政策。

隨後演變成界定善惡的標準，對中國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王奇生所言，1920年代的中國，「革命」與「反革命」被擴大為非常寬廣層面的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階級較量。不同政黨以及同一政黨內部的不同派系之間，競相爭奪對「革命」話語的詮釋權，同時將「反革命」的頭銜加諸不同政見者和政治敵對黨派之上^⑧。革命話語權成為各種政治勢力塑造自身合法性的有力工具，也成為各大政治派系內部政治鬥爭的工具。國民黨、共產黨和中國青年黨對革命話語權的使用和爭奪，以及中共建國後對「反革命罪」的濫用和「鎮壓反革命」的發動，都表現出了這一劃分標準對中國政治影響之廣泛和深遠。

共產國際劃分派系的策略和做法得到了鮑羅廷(Mikhail M. Borodin)等在華代表的貫徹。1924年，國民黨一大討論《中國國民黨章程》，鮑羅廷便開始醞釀並決定使用劃分左、中、右派的做法來對付國民黨。他的這種決策，「像一條危險的伏線，潛藏在國共兩黨內部及兩黨之間的關係中。」(頁241)根據鮑羅廷的策略，要依靠和壯大左派，形成左派運動，爭取中派，剔除右派，他稱這種做法為「楔子策略」(頁282)。共產國際的代表在國民黨實行左、中、右派的鑒定和劃分，並根據政治屬性決定方針政策。1926年「三二零事件」(中山艦事件)後，共產國際認為蔣介石擁護蘇聯，從而將其劃分為中派，決定向其退讓(頁413)。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指示和領導下，對蔣及國民黨一再妥協退讓，最終犯下「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但共產國際的妥協和退讓並未能維護國共的合作局面。

1927年，蔣發動「四一二政變」，在上海大肆屠殺國民黨左派、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走上反共反蘇的道路。政變發生後，共產國際又試圖依靠汪精衛這個「左派」掌管國民黨，繼續貫徹其革命方針和革命理論。但汪隨即於7月發動政變，實行分共。國共關係徹底破裂，共產國際的策略遭遇失敗。

共產國際根據蘇俄的利益需要，按照蘇俄、蘇維埃制度、工農運動和階級鬥爭等標準來進行派系劃分，以分化國民黨，爭取中間勢力，壯大左派革命勢力，但效果卻不如其意。這種標準本身就極為模糊而變化多端，以蘇俄國家利益為是非標準，不能對國民黨及其領導層進行正確的認識和評估。這種不合時宜的做法，導致了共產國際對蔣介石的一再妥協，對汪精衛的盲目信任，最終導致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曾劃為左派的胡漢民、蔣介石、汪精衛等先後走上了反蘇反共的道路。

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在劃分派系方面也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而行動。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遭到鎮壓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其涉華工作人員中劃分左、中、右派的做法經張國燾之口傳達到中共黨內，於是中共也對國民黨進行分化(頁283)。自此，中共就對國民黨的領導層實行政治鑒定和派系劃分，並據此採取分化策略，但效果並不明顯且未能持續。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中共政策日益「右傾」。共產國際這種出於蘇俄標準和利益的派系劃分，不僅沒有能夠壯大中國革命勢力，反而造成國民黨和中共黨內的分裂，這種不合時宜的策略也最終導致其對華政策的

完全失敗。李玉貞把共產國際對國民黨內部劃分派別的做法，最終歸結為其對蘇俄國家利益的維護，從中可以看出蘇俄對華政策多樣性和多變性中隱藏着的一貫性和連續性。

四 小結

《國民黨》一書洋洋灑灑七十餘萬字，無論是觀點的新穎性，視角的獨特性，內容的詳實性，史料的珍貴性，都將使它成為一本引起中國近現代史學界關注的著作。但該著仍有有待完善之處。作者從共產國際和國民黨的利益訴求出發研究雙方關係，自然更能接近歷史本來面目。不過，在二十世紀20年代，英美等列強也與國民黨發生了密切的關係，這對國民黨的外交政策自然有很重要的影響，而作者似未能充分闡述。但對於一本具有開創性價值的著作來說，其論述已經極為詳實和全面，這些缺點自然都是瑕不掩瑜。

註釋

① 如楊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和《「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便得益於蘇聯相關檔案的開放。沈志華對蘇聯解密檔案的搜集、整理、使用工作尤為重視，並依靠這批史料對中蘇關係和蘇聯史的一些重要問題做了重新界定，出版了《朝鮮戰爭揭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和《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等著作。同時，學界對俄方檔案資料的編纂和翻譯也極為

重視，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寫了《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王學東主編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有力地推動了中蘇關係的研究。

② 在長期的研究過程中，李玉貞著有《孫中山與共產國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和《馬林傳》(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等專著，編纂或翻譯了《青年共產國際與中國青年運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和《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等檔案史料和文獻資料。

③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1919年7月25日)，載《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頁79-81。

④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宣言〉(1920年9月27日)，載《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頁92。

⑤ 〈中國國民黨宣言〉(1923年1月1日)，載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

⑥ 〈孫文越飛聯合宣言〉，載《孫中山全集》，第七卷，頁51-52。

⑦ 〈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載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87。

⑧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67。

《國民黨》一書洋洋灑灑七十餘萬字，無論是觀點的新穎性，視角的獨特性，內容的詳實性，史料的珍貴性，都將使它成為一本引起中國近現代史學界關注的著作。